

陳
伯
達

關
於
十
年
內
戰

人
民
出
版
社

陳伯達

關於十年內戰

（一九四四年春天，在延安參加學習
中國共產黨歷史時的習作）

人民出版社

目 錄

一	反革命的朝代有變遷，但革命的火是不能熄滅的.....	一
二	從中國社會經濟的和政治的情況產生出兩種政權的長期對立。	
三	農民土地革命、武裝、根據地.....	三
四	靈活的政策是對的，直綫的政策是錯的.....	六
五	建黨、建軍、羣衆工作.....	五
五	結束語.....	四

一 反革命的朝代有變遷，但革命的火是不能熄滅的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震動了世界。但這次革命由於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的反叛和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而陷於失敗。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間對於這次革命所達到的成就以及革命新高漲的不可避免，作了以下的估計：

「偉大的人民革命總是不會在其始初發動階段上達到澈底勝利的。這種革命是經過來潮和退潮而增長和鞏固起來的。各國情形都會是如此，俄國情形也曾是如此。中國情形也將是如此。

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它已使數萬萬被剝削被壓迫者從歷來睡夢中醒覺而積極動作起來，已最終揭破了各派軍閥底反革命作用，撕破了那班替反革命勢力服役的國民黨分子底假面具，鞏固了共產黨在下層民衆中間的威信，把整個運動提到了更高的階段，並在印度、印尼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千百萬人民中間喚起了新的希望。只有瞎子和懦夫才能懷疑到中國工人和農民是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漲。」（「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斯大林同志這個科學的論斷和偉大的預見，已經完全由歷史所證明。毛澤東同志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發展了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說，而指導全黨同志把中國革命從極端困難的地位引導到新生的道路。

百年來，革命與反革命在中國已有許多次的反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首要人物先後反叛革命，算是最大的反覆，而由此所引起的階級關係重新結合的錯綜複雜，也爲以前所沒有。

國民黨的首要人物及其助手們屠殺了革命的工農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代替了北洋軍閥的舊統治。他們的權力究竟是代表了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的權力？它和北洋軍閥的舊權力有沒有差別？如果有差別的話，是內容的差別，還只是形式的差別？如果內容有差別的話，是全部的差別，還只是某些部分的差別？我們黨需要答覆這些問題，因爲這些問題是決定我們黨的政策的基础，而且正確地答覆這些問題，就可以打碎一切反革命派（包括托洛茨基陳獨秀派在內）的囁舌。一九二八年十月間，毛澤東同志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答覆了這些問題：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按：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是指民族資產

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

毛澤東同志說這是新軍閥的統治。就是說，這是反革命的軍事專政。北洋軍閥的統治也是反革命的軍事專政；但是，這是新的反革命的軍事專政，其所以是新的，因爲這是國民黨式的軍閥，而不是北洋式的軍閥。這些新式的軍閥和舊式的軍閥分別在那裏呢？分別在於：這些新式的軍閥在實行反革命的軍事專政以前，曾經在一定的限度上參加過革命，曾經是在革命旗幟下和舊軍閥打過一些仗的。因此，他們對羣衆有過某些影響，他們反革命後，那種影響雖然會消失下去，但是，他們却可以在一定時間內利用那種影響作爲反革命的欺騙，以補助反革命的直接軍事恐怖。不僅如此。這些新式的軍閥和舊式的軍閥之最大的分別，更在於：這些新式的軍閥是有一個以政黨爲形式的集中組織，並有各種補助形式的組織，以作爲自己反革命的工具；而這個政黨先前曾經是一種革命的政黨，曾經成爲各階級的革命聯盟，但是，新軍閥却篡奪了這個黨的領導權，並篡用了這個黨的歷史名義，去做反革命的事業，把它變爲反革命的政黨，而舊式的軍閥却沒有這種政黨的組織，沒有這種反革命的便宜。

這種新軍閥的統治，是代表一定的社會階級的統治，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就是：「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所謂「依然」，就是說，新舊軍閥所代表的基本階級內容還是相同的。但是，經過一度大革命的風暴，大買辦大地主的舊式統

治已經統治不下去了，他們需要新式的統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是他們開始形成這種新式統治的調度，帝國主義者則實際上在背後發號施令。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於反對人民而參加了反革命，同時也把自己轉化爲買辦資產階級，轉而充當了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新軍閥的統治就是大買辦大地主新的反革命的軍事專政。這個新的反革命的軍事專政，是以上海的或所謂「江浙」的流氓式的金融買辦勢力爲中心構成的。上海流氓頭子們在這時候公開登上了政治舞台，成爲決定國家政治和國家財政的「黨國要人」。買辦、流氓、軍閥、黨棍彼此在金融上在政治上互相變化，並混合爲一體，造成買辦和流氓的特色政治。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所出現的一種特色政治。此外，這個大買辦大地主的新專政在其建立的初期，不但他們的某些新代表曾經充當過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可以迷惑人們一時的視聽，而且還特別故意提拔個把子那種平日和民族資產階級有明顯聯繫的分子或政治代表人，叫他充作這個政權底下的一個毫無權力的不起何種決定作用的角色，當成粉飾品，並表示這是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反革命的酬勞。但是，即使是這麼一種角色，也在很快的時間內就被踢開了。

這樣的專政，反革命的專政，本來是帝國主義者所策劃上台的，必然是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各帝國主義者砲擊南京，結果反而得到南京蔣介石政府的道歉，示敬，賠款。日本帝國主義者屠戮濟南，不但沒有得到抵抗，各地「日僑」同時反而得到蔣介石政府特

別通令的保護……。帝國主義者不但利用這種新軍閥的統治而捲土重來，恢復第一次大革命前的聲勢，並且進行新的覬覦了。不久就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這樣的專政，反革命的新軍事專政，當然不是如叛徒托洛茨基陳獨秀匪幫所胡說的什麼「資產階級的勝利」。這個專政只是保護外國帝國主義以及城市買辦和鄉村豪紳（地主）的利益。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代所鬥爭得來的一切自由民主權利都被取消，他們鬥爭得來的經濟利益都陸續被剝奪了。民族資產階級也仍然沒有得到他們自己所希望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

最好讓些事實來說明。

先看看工人階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所處的情況吧。

由一些自由資產階級學者主持的北平社會調查所所編輯的「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鑑」序言上曾經這樣地述說了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四個整年的工人階級的遭遇：

「這四個整年，可以說是中國勞動界完全在國民黨監督指導下的一個時期。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總工會的解散，標記了這個時期的開幕。

……概括的說來，四年中國國民黨的當政，似乎對於中國勞工，未發生什麼積極的影響（作者意思是說，並不是幫助工人的）。……勞工的自動的精神，很受摧殘。凡不得國民黨的承認的工會，不是被解散，便是被改組。這樣的官辦的工會，自然要失去它的活

動力。……指導者只有利己的企圖，……這個官辦的工會，便成了社會的禍害了。……國民黨內部的裂痕，更不時引起黨治工會的糾紛。總之，在這四年裏，中國的勞動運動，可以說陷於消沉。……工會的公開活動，受了莫大的限制和紛擾，却是無容諱言的。」（見該書二頁）

當然，這些話是說得很溫和的，但却表明了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的工人階級和在國民黨反革命的「清黨」以前的工人階級是處在完全不同的天地。

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〇年所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對於大革命時代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工資，有過一些簡單的敘述：

「上海總工會被封閉之後（四月十二日政變之後），上海工人的工資是減低了，尤其是上海紗廠工人的工資。武漢工人的工資，能够維持所謂『共產時代』的程度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例如銀行的行員），而百分之八十是減少了。廣州起義之後，各業資本家都實行減少工資，例如油業，甚至於接連減少了三次……」（見「布爾塞維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一一三頁）

這是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所給予工人階級方面的結果。現在再看看農民們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的情況吧。

這裏我不去敘述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反對農民革命的如何殘酷。這個統治本來是在反對工人、農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曠古未有的殘酷鬥爭中逐步建立起來的。這裏我只

想把農民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和在舊軍閥統治下的情況做一簡單的比較，而最好拿田賦的附加稅來做比較。下面是從「田賦附加稅調查」摘引出來的一些例子（拿一九二七年的附加稅和一九二八年比較）：

江蘇溧陽：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正稅

九元一角

九元一角

附加稅

九元六角七分五厘

九元九角一分二厘

江蘇宜興：

正稅

六元

六元

附加稅

三元六角四分六厘

十四元七角九分

江蘇南通：

正稅

三元八角五分

四元一角

附加稅

五元八角九分六厘

十一元一角〇三厘

浙江金華：

正稅（上忙）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附加稅（上忙）

一元一角二分四厘

一元四角五分四厘

浙江松陽：

正稅

五元一角（有抵補金一項）

五元一角

附加稅

四元〇九分二厘

四元一角九分四厘

上面所以把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來比較，就是因為這兩年是新舊軍閥統治交替的分水嶺。反動統治的壓迫和農民的負擔，一代超過一代，上述的數字完全加以證明了。

「田賦附加稅調查」附述浙江松陽縣一個老人的來函，特別這樣寫道：「遜清光緒二十年（即一八九四年）以前，田賦尙無附稅。附稅之徵收，始於光緒二十年，而達於繁重苛雜，乃爲民國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以後之事實。」該書關於河南太康的情形也這樣寫過：「……附加在清代甚少，至民國四年以來，雖民國五年及民國六年有減少之事實，但至民國十七年即增至每兩徵收銀元一元七角餘，民國二十一年，更增至六元七角餘。」總之，農民受到更加痛苦的熬煎，這是國民黨統治地區普遍的事實。上面摘引的數字還是限於國民黨新軍閥統治的初年，以後更逐年增加了。比如上述南通的附加稅到一九三三年就已超過正稅五倍以上；爲新軍閥蔣介石所直接統治的江蘇許多地方的附加稅到一九三三年已超過正稅十餘倍到二十倍以上（比如高郵阜寧十一倍，淮陰十二倍，漣水十四倍，如皋崇明十六倍，海門則竟至二十六倍以上）；湖南則超過十倍到三十倍（此條參考中華書局版「中國農村問題」），而四川的田賦竟預徵到民國六十餘年。

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更加嚴重的榨取，就必然引出耕地面積更加減少和荒地面積更加增加的結果。試看下面所引的數目字。

關於耕地面積者：

年份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八年

耕地面積

一、五七八、三四七、九二五畝
一、四四二、三三三、六三八畝
一、五〇九、九七五、四六一畝
一、三六五、一八六、一〇〇畝
一、三一四、四七二、一九〇畝
一、二四八、七八一、〇〇〇畝

(以上爲「中國年鑑」所載北京農商部的統計)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主計處的統計)

關於荒地面積者：

年份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二年

荒地面積

三五八、二三五、八六七畝
四〇四、三六九、九四七畝
三九〇、三六三、〇二一畝
九二四、五八三、八九九畝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畝
八九六、三一六、七八四畝

(以上爲北京農商部的統計)

一九三〇年

一、一七七、三四〇、二六一畝

(一九三〇年南京內政部的統計)

(以上材料均摘引自「東方雜誌」三十卷十八號「中國耕地面積漸減的傾向」)

這種事實也即是說，中國農業生產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下日益萎縮。

又次，我們看看一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新軍閥統治下生活的情况。這裏且不提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吧，他們在思想上所受的壓迫，那應該說，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裏只提一提關於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情况。

原先在舊軍閥統治下，有牙稅、當稅、屠宰稅，這是和營業稅性質相同的東西，除此以外，沒有另行舉辦營業稅，只有個別省份偶然舉辦過，但都為時很短，就又廢止。但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却舉辦了營業稅（是在裁厘的名義之下舉行的），把牙、當、屠宰各稅合起來，它的壓榨就比舊軍閥統治下擴大得多了。我在這裏根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民國續財政史」所載的各省份一九二五年度關於牙、當、屠宰各稅的收入預算表和一九三一年度關於營業稅的收入預算表，舉出幾省為例，比較如下（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材料缺，所以沒有加以比較）：

省份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一年	增加指數（以一九二五年為一〇〇）
江蘇	八八七、八〇〇（元）	四、九〇〇、〇〇〇	五五二%
安徽	三六四、八〇〇	一、六三五、〇〇〇	四四八%

浙江	三五五、〇〇〇	四、五七七、四六八	一、二八九%
湖北	三七三、〇二七	三、〇四六、〇〇〇	八一七%

(參看該書卷七，一〇一至一四四頁的材料)

根據這個材料來說，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後，到一九三一年為止，只經過幾年的短時間，在國內市場不振的條件下，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負擔比起在舊軍閥統治下增加三倍到十一倍以上了。這還是僅就營業稅來說。如再加上雜稅雜捐，負擔就更大了。舉兩個省份的雜稅雜捐收入預算表為例：

省份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二年	增加指數(以一九二五年爲一〇〇)
江西	一〇九、三八八(元)	五八三、五〇〇	五三六%
湖北	六五四、六四一	一、〇三三、二〇〇	一五八%

(參看該書卷七，一四六、一四七、一四九、一五〇各頁的材料)

這些雜捐雜稅和上面所說的營業稅，當然不都是由直接營業者負擔，而時常轉嫁給普通的消費者。但小資產者營業的發展是受了更大的阻礙，並將加速他們的破產的過程，這點是很明白的。

最後，我們看看民族資產階級在新軍閥統治後的情況。

這裏舉出紡織工業為例。一九三四年「申報年鑑」所載紡織業的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逐年發展的材料，有如下列：

歷年紗綫錠比較（單位千錠）

年份	華商	日商	全國統計	華廠所佔之百分比
一九二五年	二、〇四九	一、三三二	三、五七〇	五七・七
一九二七年	二、〇九九	一、三八三	三、六八五	五九・七
一九二八年	二、一八二	一、五五五	三、八五〇	五六・七
一九二九年	二、三八六	一、六五二	四、二〇一	五七・〇
一九三〇年	二、四九九	一、八二一	四、四九八	五六・〇
一九三一年	一、七三〇	二、〇〇三	四、九〇四	五五・七
一九三二年	二、九一〇	二、〇九六	五、一八九	五五・二
一九三三年	二、七七三	—	五、二〇〇	五五・二

歷年布機比較（單位台）

年份	華商	日商	全國統計	華廠所佔之百分比
一九二五年	一三、三七一	七、二〇五	二二、九二四	五八・三
一九二七年	一三、四五九	一三、九八一	二九、七八八	四五・〇
一九二八年	一六、七八七	一〇、八九六	二九、五八二	五六・七
一九三〇年	一五、九五五	一一、四六七	二九、三三二	五四・四
一九三一年	二〇、五九九	一九、三〇六	四二、五九六	四八・四

一九三二年 一一、五五九 一八、二八九 四二、七三九 五〇・四
一九三三年 一九、〇八一 三九、五六四 四八・二

上表說明了：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後，中國民族資本的紗綫錠數和布機數在全國總數中的百分比是逐步下降了。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對於中國民族資本日益佔上風了。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國民黨政府的所謂「關稅自主」，實際上，使外國資本所得的利益更大。正像一個反動派歷史家所敘述的：

「自關稅自主以來，外人以稅率提高，……乃於通商口岸，添設工廠，蓋條約允許外廠製造之貨物，所納之稅，同於華商製造之物品也。」（陳恭祿：「中國近代史」）

這樣，雄厚的外國資本——尤其是日本資本——就日益壓倒中國民族資本，喧賓奪主。國民黨官辦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所編的「十年來的中國」也不能不這樣承認：

「自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來，七八年之內，國人投資一種新工業，資本超過百萬元者，幾如鳳毛麟角……」（見該書四六頁）

把上面所敘述的各種歷史事實概括地說來，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

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按：指民族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

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此次失敗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資產階級（非買辦豪紳階級）也受了打擊。」（前面所引，均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顯然，托洛茨基陳獨秀匪幫所謂國民黨的統治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這不過是掩飾買辦豪紳階級這個反革命統治的實質。這種卑鄙下賤的反革命的辯護士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駁斥的。

因此，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

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前面所引，均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要這樣才能培養出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若果否認這個民權革命的階段，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這種誤解對於中國革命極有害。我們經過的鬥爭中，證明國際意見的真實。」（「紅四軍六次代表大會決議」）

顯然，托洛茨基陳獨秀匪幫否認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不過是為的幫助帝國主義、買辦豪紳階級延長反革命的統治。他們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不過是為的作為反